



(延安革命纪念馆藏)
任弼时夫人捐赠的《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明文艺道路的著作

这本名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书为纵式长方形,32开本。上部与左侧为红色,中间从右至左有“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字样,其中“文艺座谈会”的字样为竖式排列;右边为白色,中间部分是毛泽东的头像,头像下面有倾斜的“任弼时”字样,和一枚红色的印章,印章内“任弼时”几个字迹不清,下面是“东北书店印行”六个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青年学生及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当他们看到延安的现状和他们想象的有所差别时,情绪上就出现了一些波动。甚至有人写文章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自视清高,不愿意与老百姓交谈和往来,认为他们是土包子。他们不仅在行为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上也脱离了人民群众。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曾经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一次。”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先后邀请了许多文艺界人士,和他们交流文艺界的情况,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5月,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的文化、文艺界人士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西厅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一次盛会,其目的就是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5月2日,会议召开,毛泽东到场并作了“引言”部分的发言,23日又在会上作了结论,被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巨大的反响,一些解放区或者根据地纷纷出版这部著作,有的地方将这本著作一印再印,仍然供不应求。

1947年9月,东北书店出版发行了《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著作。

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是任弼时的藏书。1964年9月,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去北京了解任弼时同志在延安居住情况时,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宗瑛将这本藏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文物珍藏并对外展出。

文图均来源于“学习强国”

小铜器 大用途

钩 希



鎏金直柄单流铜銚(资料图片)

在太原市博物馆的展柜中,一件名为鎏金直柄单流铜銚的铜器引起了我的注意。该铜器只有手掌大小,1957年出土于万柏林区大井村的北齐重臣韩祖念墓。

这件铜器通体金黄,采用了“金汞齐”工艺。这是一种将金和汞的混合物涂于铜器表面,通过高温焙烧将汞蒸发,留下均匀金层的工艺。仔细观察,器物表面无铸造范线,因而可推断是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

銚三足鼎立的造型源自汉晋时期的铜鑊斗,但通体鎏金与模块化的设计则源于西域,同时期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的金银器,正是以满器鎏金、组件铆接为特征。

銚并非单纯的实用器:三足可稳置炭火,短流便于分斟酒液,附带的铜匕推测是用于搅拌。据《齐民要术》记载,此类温酒器是北齐贵族宴饮仪式的重要道具。但从今日的角度看来,采用含有汞这种重金属的工艺,显然不适合盛放食品。

一枚异域戒指 见证晋阳繁荣

常一民

北齐徐显秀墓内的随葬品中,有一枚劫后余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它精美绝伦的外观下,透露出一丝神秘色彩。

徐显秀的墓室近似方形,面积约40平方米。靠近墓室西边,是一个面积约10平方米的砖砌棺床,用来放置墓主人棺椁遗骸和随身之物。围绕棺床的地面则摆放有墓志、陶俑和罐、盘、碗等日常器物。墓内地面上,摆放各种器物500余件。让我意外的是,嵌蓝宝石金戒指——这枚墓主人随身携带的珍贵物品,不是在棺床上,而是掩埋在棺床东侧破碎的陶俑下面。

为什么会这样?

抬头仰望墓室,四个幽暗的盗洞出现在面前,结合墓室杂乱破碎的随葬品,不难推测,这座墓葬曾经多次被盗掘。墓葬中的一件元代瓷碗,说明早在元代就有盗墓者曾光顾过这里。很可能就是这个盗掘者,在灰暗的光线下翻捡遗骸时,将金戒指翻落在了陶俑堆中,从而躲过了后几次盗掘。

这枚戒指由黄金戒环、戒托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戒指环在靠近戒托的两端各雕饰一种似龙非龙、似狮非狮的怪兽。兽首的颈部似鳞甲,又似卷成一团的鬃毛,兽头上的尖耳紧贴向后,双目圆睁,张口露齿。两兽口似乎咬着戒托下部。椭圆形戒托四周,围绕着一圈锤揲而成的连珠纹,戒托中镶嵌着一枚蓝宝石,经检测为电气石,又称碧玺。蓝宝石戒面上阴刻一个人物图案。图案中人物头戴一顶很大的近似狮头的兽首形头盔,脸庞较窄,深目高鼻,上身穿紧身圆领半袖衫,下身穿紧身裤,脚蹬皮靴。人物为立像,膀宽腰细,身体略向左侧,头向右扭回,两腿一前一后,后腿提起,向前走而又回顾,似在舞蹈,又似在举行某种特殊的仪式。人物两臂上弯,双手各倒提着一件杖形器。右手所握杖形器较短,上为尖状,下为圆球形。左手所握杖形器较长,上为圆球形,下为尖状,整个下端看起来像锚或箭簇的形状。两件杖形器,既像是代表权力的权杖,又像是通灵的法杖。总之,无论是似龙似狮的神兽黄金戒指环,还是

蓝宝石戒面上的人物形象,都不是中原传统式样。它们的来源要从遥远的中西亚乃至古希腊、古罗马去寻找。

同时期,这种似龙似狮的双兽首戒指环和连珠纹戒形制及其制作工艺,在中西亚一带十分流行,且陆续有实物出土,徐显秀墓这枚戒指的来源显然指向了该地区。

至于戒面上的神秘人物,从狮首形头盔与手持杖形器看,似乎与头戴狮头盔、身披狮皮、手持刺棍棒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人物,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的特征相似。此外,古希腊国王巴克特里亚银币、斯基泰国王银币上的宙斯像,一手持权杖,一手持上下都是刺的棒子,和戒面人物手中所持的权杖有相近之处。不论它是两者中的哪一个,都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父子有关。有鉴于中西亚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紧密联系,加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都是碧玺矿的主要产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枚珍贵的蓝宝石金戒指出自中西亚地区,或者进一步说,它是出自擅长制作金银器的粟特人之手。

一枚珍贵的蓝宝石金戒指,为什么会跨越千山万水,最后到了徐显秀墓中呢?这和著名的丝绸之路有关,更和北朝时期的晋阳有关。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城生活着大量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来客——粟特商胡。当时的晋阳,号称“霸府别都”,作为政权权力中心,皇室贵胄、达官富贾云集,贵族阶层形成了生活奢华和追求华美的风气,追逐丝绸之路文化生活成为上层人物的时尚。

北齐东安王徐显秀对异域珍宝的喜爱,在他的墓葬中展现得尤为直观。这枚嵌蓝宝石戒指磨损明显,显然是其长期佩戴所致。同时,在他墓室石门雕刻的彩绘神兽,成为他喜好异域之物的又一实证。在这两扇石门上,上部雕刻的是一个鸟身兽头蹄足神兽,其形象来源和欧亚大草原的羽翼兽有关。而在石门的下部,原来一边雕青龙,一边雕白虎,但最后埋入墓葬时,却是用两只口衔瑞草的彩绘神鸟覆盖了原来雕刻的青龙白虎。据研究,萨珊波斯时期的衔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嵌蓝宝石金戒
(山西博物院藏)

诗书合璧 堪称经典

郭 冰

近日,由太原市文物局主办、太原市博物馆承办的“晋韵流远——太原市博物馆藏书画艺术展”在太原市博物馆二层临展厅正式启幕。本次展览以“仕隐交响”“道艺相生”“金石维新”三大篇章为脉络,精选馆藏128件,全景式呈现清代山西文人的艺术探索与精神嬗变。

展览中,晚清名臣徐继畲的《行草书扇面》尤为引人注目,扇面全文如下:正月楼船过大江,海风吹雨洒船窗。云消虹霓横山阁,潮落鼋鼍避石矼。阙下谏书谁第一,济南名士旧无双,湖阴暑退多鱼鸟,应胜愁吟对怒涛。

徐继畲以编撰《瀛寰志略》闻名,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其书法作品存世较少,此扇面作为其手迹,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反映了晚清文人士大夫的诗书修养与交游雅趣。

该扇面采用行书书写,笔势连绵潇洒,墨色浓淡自然,既有楷书的端稳骨架,又融入草书的流动意趣。字间疏密错落,与扇形弧线布局相得益彰,体现传统书法“计白当黑”的章法理念。

扇面为传统折扇形制,书写时需顺应弧形空间调整字势,首字起笔沉稳,末行随扇骨收束,形成“上宽下窄”的视觉感。

另一件清代诗人吴雯的《行书七律诗轴》,则展现了清初山西书坛的独特风貌。诗轴全文如下:灏气常思契,泥洹眼面前。不异洪荒坐,来虚室。养就金鹅渐褪黄。百折情坚道力,几回心事尽名场。凭阑究取云生处,璎珞街前认旧乡。壬午八月,吴雯。

吴雯,清代诗人、书法家,山西蒲州(今永济)人,与王士祯并称“南王北吴”,诗风清逸,书法承“二王”而自成一家。

该诗轴以行书为主,兼藏楷意,起笔含蓄,收笔多顺势出锋,线条刚劲如“折钗股”;墨色浓淡自然,枯润相生,可见运笔节奏明快。总体上呈现“纵有行、横无列”之感,字间疏密错落,通篇气韵连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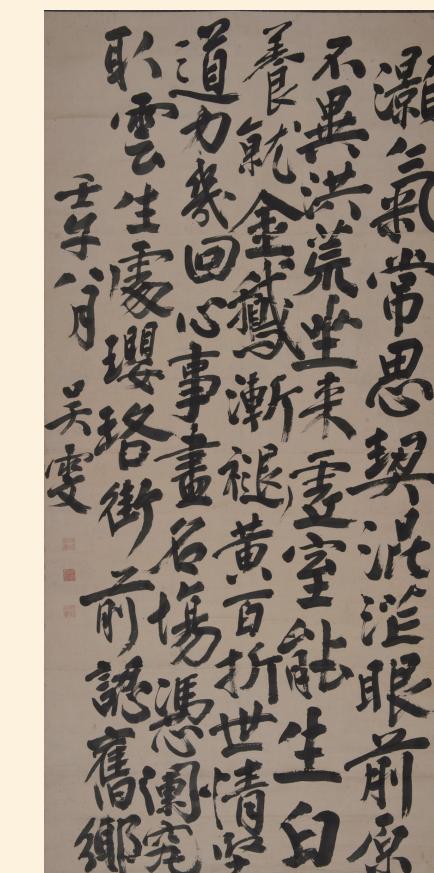
吴雯书法存世较少,此书介于傅山“狂放”与陈廷敬“端严”之间,在清初山西书坛属清逸洒脱一脉,堪称“诗书合璧”的典范。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清·徐继畲《行草书扇面》



清·徐继畲《行草书扇面》



清·吴雯《行书七律诗轴》

珍贵的元青花牡丹罐

岳 仙

在山西博物院中,有一件异常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这种元代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国内博物馆仅有4件,分别藏于山西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包头博物馆。除包头的为出土外,其余三件均为征集而来。

此罐胎体厚重,体形硕大,造型饱满庄重。胎体由底、腹、口沿分段制作而成,胎底有粗疏的旋削痕迹和跳刀痕,通体施青白釉,釉色洁白。釉下施青花纹饰,呈鲜艳的靛青色,积釉处有蓝黑色斑点。通体绘花纹五层,颈部为姜牙海水纹;肩部饰缠枝莲花;中部是以缠枝牡丹为主体纹饰的牡丹花,仰覆呼应,正反缠结,栩栩如生;胫部饰变形双勾莲瓣纹,各瓣彼此分开。主题纹饰与胫部纹饰之间饰以卷草纹,各层纹饰以双弦纹相隔,虽然通体装饰,但层次清楚,繁而不乱。

继唐代白瓷、宋代影青瓷之后,景德镇窑在釉下彩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采用新的工艺和色料,成功烧制出清新素雅的青花瓷。一般认为,青花瓷虽发源于唐代,但成熟于元代,历经明清,成为我国瓷器品种的代表作。

青花瓷的制作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成型的坯胎上描绘花纹,然后施透明釉入窑,在1300℃左右高温下一次烧成。

为什么说元代青花瓷器异常珍贵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胎体独具特色。它以瓷石加耐高温的高岭土共同制胎,氧化铝含量较高,具有坚韧挺拔、不易变形的特质。

二是元代青花色料使用的是贵比黄金的进口的钴料。这种钴料主要产于中亚和西亚,又被称为“苏泥勃青”或“苏麻离青”,因其含锰量低而含铁较高,因而呈色艳丽深沉,并带有紫褐色或黑褐色较光润的斑点,有的黑褐色斑点显现出“窑光”。

三是其存世量极其稀少。完整的元青花存世量全球不足400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不到三分之一,且都在省级博物馆作为镇馆重宝予以展出,如南京博物院的谦月之下迎韩信梅瓶,河北博物院的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等。

四是生产周期短暂。青花瓷在元代大规模烧造仅30余年,且多用于外销,国内留存极少。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山西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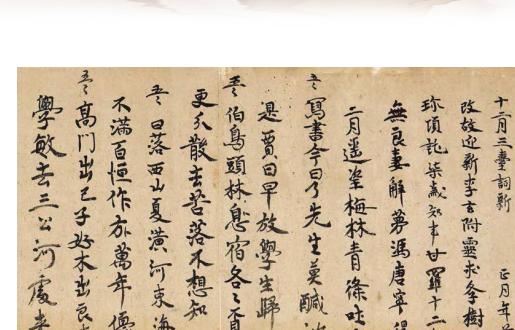
笔墨间的童心

艾 荣

塔那古墓。《论语郑玄注》是东汉经学集大成之作,以《鲁论》为底本,参校《齐论》《古论》,形成了“篇章从鲁、字句从古”的校勘体系。可惜的是,其所注《论语》自五代后便湮没无闻。卜天寿抄本完整呈现了《八佾》《里仁》《公冶长》等篇,是唐代学龄教育的核心教材。更值得注意的是,卷末《三台词》《千字文》的补录,印证了唐代西州(今吐鲁番)学堂“经史子集”并重的教学体系。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字迹略显拙拙却也工整,而且还透露着孩童天性:“公冶长”误抄为“公治良”,最令人莞尔的是卷尾两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对放学的期盼,与今日学童别无二致;“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的吐槽,更让严谨的书卷多了些稚嫩气息。

卜天寿作为“西州高昌县昌乡厚风里义学校”,他的存在证明唐代在新疆地区推行了与中原同步的州县官学体系,颠覆了新疆地区在古代属于“边疆蛮荒”的刻板印象。郑玄注本中“儒以道德教人”的注解,与吐鲁番出土《唐西州学生守则》强调的“孝悌忠信”如出一辙。



卜天寿抄写《论语郑玄注》局部(资料图片)

在吐鲁番博物馆的恒温展柜中,一卷泛黄麻纸静静舒展。这是12岁学童卜天寿于唐景龙四年(710)抄写的《论语郑玄注》,千年前稚嫩的笔迹跃然纸上。

这卷总长538厘米的抄写本出土于1967年新疆阿斯